

南湖学术文库

梁启超趣味论

方经梅 / 著

研究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南湖学术文库

梁启超趣味论

方经梅 / 著

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趣味论研究/方红梅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01-007908-0

I. 梁… II. 方… III. 梁启超(1873~1929)-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6006号

梁启超趣味论研究

LIANGQICHAO QUWEILUN YANJIU

方红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21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07908-0 定价:3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一

聂振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方红梅博士的大作《梁启超趣味论研究》即将出版问世,她来信嘱我为之写序,我欣然领命。我与红梅博士本不相识,对她的认识是从阅读这部书稿开始的。书稿写得洋洋洒洒,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显出扎实的功底。文如其人,可以看出她很爱思考,也善于思考。

善于思考的人,其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必备的主观条件。分析需要有理论的锋刃,才能由浅入深,去粗取精;综合需要有建构的能力,从而把分析、解剖所得到的各种片面的、具体的认识综合为一体,并经过思辨和抽象上升为体系。当然,分析与综合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与综合,都需要有联想和想象的参与才能成为一种新的创造,而联想、想象则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历史经验为根柢,否则,就可能是杜撰,甚至是胡思乱想。一篇论著,资料丰富而翔实,分析鞭辟入里,论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才算树立了一家之言。这正是我赞赏红梅博士这部著作的原因所在。

研究梁启超先生,是个难度较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革新家和启蒙思想家,又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大师,其学术思想几乎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重要领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他爱国心切,思智敏锐,在四海翻腾、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激流勇进,与时代同步,因而

思想主张变化较多较大,不易把握。作为学者,他一生勤奋耕耘,著作等身,思想阅历丰富多彩,在一些领域独领风骚。不对梁启超的整个思想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不系统地阅读他一千多万字的著作,而要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梁启超并作出公正的评价,我觉得不太可能。即使研究他某一方面的思想,如本书只研究梁氏的“趣味主义”,也是如此。当然所谓“系统地阅读”,也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主次、深浅、重轻之分。有的要逐字逐句地细读、研读,反复地读,有的是一般的阅读取得认识、理解,有的则是浏览一下知个大概,因为人的精力毕竟很有限。但不如此,就可能只知其一而不计其余。例如有人写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美学思想,把他在戊戌变法和思想启蒙时期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思想,当成梁启超文学、美学思想的主体,甚至是当成整体而加以评论,看不到其思想认识的发展、深入的历史过程,没有反映其文学、美学思想的全貌。正如本书《引言》所指出:“由于受激进即进步的政治意识的影响,从政坛退隐的后期梁启超的思想长期处于遮蔽状态,为人忽视。多年来学术界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梁氏被看作时代弄潮儿的‘戊戌’及‘新民’时期,仅就‘小说界革命’理论、实践及影响的研究,论文就不下于 150 篇。因出于仓促而带有明显的粗疏、草率之弊的‘三界革命’文艺观,以旗帜鲜明的革新性,以思想的巨大启蒙性与现实指向性,成就其一呼百诺的社会效应和理论影响,而梁启超晚年更为成熟、深入、稳笃的美学言论,却被淹没在人才济济的二十年代那喧阗热闹、众音皆鸣的多种声浪中,这种影响力上的差异,也是导致对梁氏前期以文论为主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连篇累牍而对其后期美学思想却甚少留意的重要原因。”再如有人从某种教条出发,先入为主地搜集材料、选择例证,而不是系统地阅读文本,也不全面地搜讨他人的研究成果,用某种政治标准衡量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只看到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而不见作为学者教育家的梁启超。而且对于梁启超的政治评价本来就不公,又如何能真实地反映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因此,常常把梁启超与时俱进的“多变”看成是政治立场“摇摆不定”,而看不到梁启超思想中贯彻始终的爱国主义主流和独立的人格精神。方红梅的《梁启超趣味论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以上偏颇方法、态度的反拨与纠正。

作者如实地把“趣味论”放在梁启超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把“趣味”作为中心“纽结”(范畴),以“趣味”的发展、演变及其向人生各个领域的渗透为线索,把梁氏的文艺思想、审美思想、教育思想和人生哲学贯通起来进行理论建构。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的设计,确有独到之处,也为其发挥一系列创见开辟了一个大平台。作者不仅论述了“趣味”的本质、特性和情感品格,不仅论述了“趣味”与艺术创作、审美活动、艺术教育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趣味”与梁氏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践履的内在关系,论述了“趣味”的生命动力和人生价值,系统而深入,独辟蹊径而言前人所未道。到此,我们则心悦诚服地相信:“趣味”确实是梁氏艺术一审美思想的中心范畴,也是“梁启超一生的精神支撑”。

梁启超是学贯古今、融通中西的大家。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既来自西方的“新学”,更来自中国传统的“旧学”。他始终坚持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为根基,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异质因素,并加以融化而出新。他形象地说,我们要与西方的美人结婚生子。本论著的作者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深入、系统地论述了“趣味主义”形成、发展的文化根源:既看到西学的新观念、新方法对梁启超的启示,更注重梁氏对自己的传统思想的继承、转化与更新。作者用两章(即第三章“仁者不忧”:趣味的境界升华和第四章“无所为而为”:趣味的生活表达)的篇幅(全书共五章)探讨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和人生哲学与梁启超“趣味主义”的思想渊源。其中对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古代范畴“自得”的钩沉、疏理、阐释以及与趣味的互释融通尤为引人注目,更给人以启发。梁启超继承和融汇了儒道释思想于一身,从而成为他的理论创构和思想发挥的源头活水。作者对趣味境界的“自得”特

征、趣味境界的心源营构以及“心超成败而得趣”、“心超得失而生趣”的论述,溯本求源,直探“趣味主义”的传统哲学根基,揭示了“趣味主义”的生命力所在,真正把握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真谛。在溯本求源中,作者旁征博引,运用自如,可以说明她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不同一般。作者认为,“仁者不忧”和“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既升华了“趣味”的境界,又把“趣味”落实到现实生活和人生态度上。作者在第四章开篇即说:“以情感的陶养以及智慧的超越性觉解为前提,人心就能达到一种消除忧惧、烦恼而充满快乐的自由境界——‘仁者不忧’的趣味境界。但是,梁启超言说的趣味,并不只是心灵受用的内在性的东西。自由而富有趣味的现实生活实践,才是趣味主义的最后目标,也才是趣味的最后完成。而趣味的境界化恰恰为趣味向实存生活的全面渗透和落实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境界化提升,把人们偶尔经验到的稍纵即逝的趣味感,发展成了能持以乐观地应答整个人生的、更长久稳定的心理结构。自由、乐观、不忧的内在精神境界是人生趣味化的内在根据,而自由快乐的生活、无所为而为的动态活动,则是人生趣味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最切实的实现。”

总之,这本《梁启超趣味论研究》资料准备充分,理论功底扎实。作者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她的思辨能力,其理论锋刃尽可能地广度拓展,更向深度挖掘。因此,该书的理论建构既大且深,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我认为,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这是一项出类拔萃的优秀成果。是为序。

2008年12月4日于北京

序 二

陈 望 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中,我最倾心最佩服最推崇的是梁启超,最想效法却又感到高山仰止,无法望其项背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作为政治家,他的成就,已成公论。他是中国走向民主、走向富强、走向现代的精神导师。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受欢迎的程度,只好用“洛阳纸贵”来形容。年轻的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卓识、卓才,亦是倾心不已。

梁启超作为学者,他的成就却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他的学术领域极广泛,其所论均具有极为珍贵的原创性,这个方面,从近代至现代亦未有过其右者。梁启超所有的学术成就中,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他的人生哲学。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趣味”。梁启超说: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①

^①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页。

说起来,也许让人不相信,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学者,信仰的却是“趣味主义”!但这确是真的。值得说明的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是行事的“最高原则”,却不是行事的最低原则。这最低与最高是大有讲究的。最低原则,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一切以个人喜好为转移,它是自私的;而最高原则,则需将社会的责任与个人的喜好统一起来,既是个人喜好,又是社会责任。梁启超非常强调的正是这社会“责任心”与个人“兴味”的统一。他说:“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①“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②

“责任心”与“兴味”涉及人活着的意义的两重基本方面:贡献人生与享受人生。贡献人生,是人的社会责任;享受人生,是人的基本权利。享受总是快乐的,而贡献则不一定,因为贡献意味着要工作,工作总是体力与脑力的付出,是劳动。既是劳动,就不可能没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压力,严重的,当然会有痛苦。这样说,“责任心”与“兴味”又怎么能统一呢?

是的,如果不做努力,二者是不可能统一的,它们的统一,有赖于精神上的超越。这种精神上的超越的实质,是将社会的责任心转化成个人的兴味。

这种转化能实现吗?能!但需要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的力量涉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对劳动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实现这种超越。

劳动是人之为人之本,它是人对社会做贡献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的快乐的基本来源。劳动有多种价值,它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去认识,而就对劳动者这层面而言,它至少有两种价值,第一,

^①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1页。

^② 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0页。

功利价值,它可以让劳动者获得一定的报酬。另一种价值则是劳动者创造性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

如果说,前种价值可以理解为劳动的外在价值,后一种价值则可以理解成劳动的内在价值。人们均能认识到前者,而未必能认识到后者。前一种意义的劳动,它能带来快乐,但这快乐是与它的报酬直接相联系的,其实快乐的是报酬,而不是劳动。后一种意义的劳动,它也能带来快乐,这种快乐,却是与劳动的报酬相分离的,它快乐的是劳动本身,而劳动本身之所以能带来快乐,是因为它是人的创造性本质力量的实现。梁启超更为看重的是这后一种意义的劳动,这后一种劳动实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梁氏认为,只要不断创造,就觉得无上快乐。

两种劳动相较,其根本不同就是,前一种劳动,是有功利性的,劳动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后一种劳动,是超功利的,劳动之外,没有一个目的。梁启超将前一种劳动,解释成“为而有”。后一种劳动,解释为“为而不有”。他说: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作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在地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①

梁启超用老子的思想来解释,当然未必切合老子的原意,这是不重要的,梁启超只不过是借老子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观罢了。梁氏主张的“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审美。康德说:“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

^①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4页。

“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①

梁启超曾著专文谈“敬业”与“乐业”问题。他认为,敬业不是人理想的工作状态,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乐业。乐业是以敬业为起点的,但不止于此,敬业的理念是道德,乐业的理念则是审美。敬业的敬,敬的是社会责任,乐业的乐,乐的是劳动中的创造。

笔者在《当代美学原理》中提出人生有三种生存方式:谋生、荣生、乐生。谋生,只是为自己及家人活着;荣生则是为社会活着,因对社会做出贡献而获得社会尊敬,从而感到荣耀。谋生与荣生均是功利性的,只不过,谋生更多地重物质功利,而荣生更多地重社会功利,谋生的功利侧重于个人,荣生的功利侧重于社会。乐生则又回到个人,但这种个人不是谋生状态中的个人,它是在实现了谋生、荣生两种生存状态之后的超越。乐生的乐,不是因谋生得利的乐,也不是荣生得荣的乐,而是因人性的健康实现获得某种精神自由的快乐。个人——社会——个人,这个过程相当于自然的人——道德的人——审美的人。

审美的人的现实存在是个人,但观念上是人类。在此问题上,梁启超也有卓越的见解。他说:“人生最大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②

梁启超喜欢讲“仁者不忧”,何谓“仁者”?“仁者”就是这种将个人看成是人类全体的人,充满爱心的人。这种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均是天下,哪还有自己个人的忧呢?所谓仁者不忧,不是说仁者没有忧,而是说没有纯属于个人的忧。“不忧”当然就是快乐了,这种乐,实质就是与天下同乐。《乐记》云:“与天乐者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7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5—2986页。

谓之天乐”。

从上个世纪末我为写《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研读了梁启超的部分著作之后,就成了梁启超的“粉丝”。当然,此前我早就知道了梁启超,但是,此前梁启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神,是英雄,是豪杰,是先知先觉者,是高不可攀的耸入云霄的高山,而在我读了他的部分著作,特别是其有关人生哲学的著作之后,梁启超在我面前就有些变化了,他仍然伟大,但不是那种让人仰视而不得其真面目的伟大,而是在亲切、随和中透显的伟大。梁启超与我距离拉得很近了,他仿佛就坐在我身边,我们在一起品茶,一起聊天,他智慧的话语,点点滴滴沁我心田,让我茅塞顿开,心境洞开,满目鲜花;梁先生的那份潇洒,那份飘逸,那份睿智,那份温馨,让我如醉如痴。为何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梁启超是审美的人,他的学问均带有审美的色彩。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进入这种状态是极少的。从那以后,我几乎逢人就说梁启超。方红梅就是在我的热情推荐和鼓动下选择梁启超作为研究对象的。

历数年之功,方红梅完成了她的研究论著,书稿获得相关领域知名专家的好评,我甚感欣慰。更令我高兴的是,梁启超的“趣味论”人生观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论述,这是我多年所企盼的。

如今,方红梅研究梁启超趣味论人生哲学的论著要出版了,她嘱我写个序,我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借此机会,也略略陈述我对梁启超“趣味论”的一孔之见,以就大方。

是为序。

2009年1月28日于武大天籁书屋

Contents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从艺术到人生:趣味的意义设定 /19

第一节 作为艺术本质和作用的趣味 /19

- 一、艺术趣味本质观的提出 /19
- 二、趣味观对艺术情感特性的揭示 /22
- 三、趣味观对艺术审美愉悦特性的揭示 /32
- 四、趣味观对艺术自身特性及其人生功能的内在关联 /38

第二节 作为美感本质的趣味 /42

- 一、以趣味界定美感 /42
- 二、趣味对美感快感特性的凸显 /46
- 三、趣味对美感快感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涵括 /49
- 四、趣味对美感超功利的精神自由特性的表征 /54

第三节 作为生活动力和价值的趣味 /58

- 一、作为自由创造欲的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 /58
- 二、心乐之趣味赋予生活以价值 /65

第二章 入“生命之奥”:趣味的情感陶养 /72

第一节 情感的生命价值:“动力”与“关门” /72

- 一、情感是人类动作的原动力 /72
- 二、情感是入“生命之奥”的“关门” /77

第二节 趣味的情感品格 /85

- 一、趣味的情感性 /85

二、趣味情感的特点:兴味心与责任心的统一 /93

第三节 情感教育:因情立趣 /102

一、趣味教育的根本是情感教育 /103

二、情感教育的“利器”:艺术 /109

三、情感教育的重要承担者:艺术家 /118

四、情感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引、提、扩 /138

第三章 “仁者不忧”:趣味的境界升华 /150

第一节 自得:趣味境界的特征 /150

一、“自得”说溯源 /152

二、趣味境界的“自得”气象 /159

第二节 心造:趣味境界的营构 /173

一、境由心造 /174

二、“宇宙未济”:心超成败而得趣 /184

三、“人类无我”:心超得失而生趣 /194

第四章 “无所为而为”:趣味的生活表达 /208

第一节 趣味的生活化:自由活动 /208

一、趣味化劳作 /209

二、学问与教育趣味 /215

三、艺术活动和自然欣赏 /221

第二节 趣味生活的实质:即功利而超功利 /229

一、趣味生活的功利性 /229

二、趣味生活的超功利性 /234

三、创化的、“仁”的人生观:对功利和超功利的融汇 /237

四、融汇功利与超功利的趣味生活观的独特意义 /243

第五章 趣味论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 254

第一节 以趣味为手段的新民救国:疗救现实的时代意义 / 254

一、精神决定论:梁启超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倾向 / 255

二、趣味性文艺:刷新国民精神的佳径 / 262

三、趣味的工具化:时代之“功”与“过” / 271

第二节 以趣味为目的的立人乐生:设计未来的前瞻性意义 / 278

一、树人思想深化的现实契机 / 279

二、树人思想向以人和趣味本身为目的的深化 / 286

三、以乐生为目的之趣味论的“调适”眼光:通往后现代精神的
前瞻 / 291

结语 / 308

主要参考文献 / 311

后记 / 321

引 言

在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重大变革的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不仅以龙卧虎跳、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直接关系到当时国家大局的发展;更凭着思想随时而新的启蒙宣传家的激情,每以新说振聋发聩,且以新眼光阐发传统文化的超时代性价值,致力于重构生机昂扬的国民新精神,其影响尤为深远。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沧江、饮冰室主人、新民子等,广东新会人。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11岁中秀才。1888年入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为正科生,治戴、段训诂之学。次年中举,受主考官李端棻特赏,与李氏堂妹李惠仙订婚。1890年入京会试落第,归途中得谒南海康有为,一见大服,遂执弟子礼,开始追随康师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翌年入读万木草堂,舍旧学,受新学,为一生学术和事业打下基础。从此,梁启超的思想逼近了时代主题,他也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1895年,在与康有为一起入京会试期间,愤惋于甲午之败,梁氏参与发动了“公车上书”,京师震撼。1896年抵沪,《时务报》创刊,梁启超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文,雄辩惊人,影响巨大,时人以“康、梁”并称。次年冬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蔡锷即是时之高才生。戊戌年,策划、参与“百日维新”,值政变,走日本。

出亡东瀛的梁启超,通过日文广泛涉猎西方文化,眼界大为开放,其思想言论为之一变,并借《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刊物而四处流播,天下人士靡然向风,举国思想,为之丕变,梁启超也因之声名大噪,盖过乃师。《新民丛报》销行尤广,发表其中的、致力于建构现代国民新人格的

《新民说》，甚至被学界认为是“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①。居东十余年间，除了理论贡献、舆论宣传，梁启超还勤于国事活动。初到日本时他热心与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联合，受到康师责备后，于 1899 年底至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务，次年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汉口勤王之役，抵沪而事败，避地澳洲，旋适日本。之后，又于 1903 年和 1911 年分别考察、游历了美洲和台湾。

1912 年底，梁启超从日本归国，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参与民国新政。熊希龄组织内阁，梁氏于 1913 年 9 月出任司法总长，次年 2 月辞职，袁世凯乃授为币制局总裁，同年 12 月又辞职。时局混浊，欲办之事，皆未获施敷即去，这进一步强化了梁启超早年就有过的想要淡出政坛、专力于教育救国、文化强国的心思。1915 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悄然南下，与蔡锷策划入滇，发起护国军，1917 年，又率先反对张勋复辟，力劝段祺瑞举兵马厂。张勋既败，段祺瑞新内阁成立，迫于形势，梁氏于 1917 年 7 月出任财政总长，11 月内阁总辞职，梁连带下野。迨后绝意政界，专意于文化、教育、学术事业。

欧战方殷时，梁启超就颇有眼光地主张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战后中国得以出席巴黎和会，梁氏功不可没。1918 年，一战告终，梁启超往游欧洲，著《欧游心影录》记其事。梁启超从欧洲发回的关于巴黎和平会议对中国不公平的消息刺激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西方思想界沉痛反思自己的文化，这深刻地影响到感受明敏、善于捕捉时代新信息的梁启超，他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并企望一种化合中西文化而又超越中西文化的、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的新文化。1920 年春梁启超归国，自是约十年不入政界，专以著书讲论为业。他主讲于清华（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并列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南开、东南诸校，且在全国各地公开讲演，还主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组织了共学社和讲学社，邀请了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来华讲学。梁氏钻研佛理史料、儒家学说、诸子哲学和传统文学，纂修文史，笔耕不辍，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颇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勤于著述的梁启超，三四年的时间就能著书数百万言，精力亦疲于是，1929 年著《辛稼轩年谱》未卒业，竟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得年五十有六。

① 蒋广学：《梁启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2 页。